

《戴震学的形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戴震学的形成》

13位ISBN编号：9787801488756

10位ISBN编号：780148875X

出版时间：2006-05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丘为君

页数：2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戴震学的形成》

内容概要

戴震，是集启蒙先驱和乾嘉考据学于一身的代表人物。本书旨在探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清代思想主流考证学间的关系。它主要在思考：在激烈地批判甚至否定传统的过程中，近代中国就知识与思想发展的角度而言，经过了什么样的历程而有乐今天的风貌。“转型期中国”（1895-1925）的代表性思想家章太炎，梁启超与胡适，在他们高举“启蒙”的旗号对传统做激烈攻击的过程中，是如何透过清代知识主流考证学的反省，来诠释并转化那个被诅咒，污名化的“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并进一步使它与自西方引进，具有威望的所谓“科学知识”接轨。

《戴震学的形成》

作者简介

丘为君 台湾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硕士、博士。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副教授、美国博克莱加大访问学人，现为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儒学礼仪系统、比较文化与思想、史学方法与理论，其中尤以近代中国的现代性经验为重。主要著作有《知识人的出路》、《自然与名教：汉晋思想的转折》、《西洋史学丛书》九册(主编)、《走入近代中国》(合著)、《监水镇志》(合著)、《台湾学生运动，1949—1979》(编著)，并发表论文多篇。

《戴震学的形成》

书籍目录

序：中国式自由主义的自我意识导言第一篇 章太炎与戴震论述的开启第一章 批判的汉学与汉学的批判第二章 戴学的清学中的地位认定第三章 作为清学中坚的戴学系统第二篇 梁启超与戴震论述的诞生第四章 戴震学的诞生第五章 梁启超戴震研究的方法与特色第六章 戴东原的哲学第三篇 胡适与戴震论述的典范第七章 从批判传统到新诠国故第八章 戴震“新哲学”的历史基础：反玄学运动第九章 戴震“新哲学”的内涵：道论、性论、理论结语附录：清代思想史“研究典范”的形成、特质与义涵前言 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结论参考文献

《戴震学的形成》

精彩短评

- 1、 体例缭乱，文字潦草，真不值一读。
- 2、 乾嘉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
- 3、 呃.....
- 4、 关于此书的评价
- 5、 一般
- 6、 各人眼力里有各色的戴震，戴震代表了清学，清学研究也脱不开当时的政治背景。
- 7、 没分量
- 8、 未读理学者绝不可以读戴震。这么好的题目就写成这个样子，只能等待后人重做了。
- 9、 戴震学的形成
- 10、 比较严谨学术逻辑的一本书
- 11、 戴震研究在民国乃一热点，该书主要部分即论述章太炎、梁启超和胡适三位大师对戴震之研究情形，学术史的意义不言自明。@新星出版社
- 12、 附录一篇
- 13、 郑吉雄教授有书评，谈及作者并未关注刘师培的戴震研究
- 14、 书不错，校对问题大
- 15、 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

1、标题引自张丽珠教授[清代新义理学三书]之三的《清代的义理学转型》的一段“全新角度的革命性”论述（里仁，2006，pp2）。意图是想仅在学术史的范围内来论说。现代学术转型似乎是当前学术史研究的重心。这一重心的转变可以看作是“中体西用”-“中西并重”-“全盘西化”-“中国本位”的一次“诠释循环”上的一个“网络交织”，这次“诠释循环”的内在视野也可以看作是面对西方的“焦虑”（当前哲人也在一再强调“只有更好地理解西方，才能更好地理解东方”），这就犹如汉唐注疏之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型时离不开西方（佛学）的内在视野一样。当大陆的学术史论述还集中在“民国学术”之时，台湾却已在“清代学术”耕耘已久。这也就理解为什么《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出自“台湾”学者之手的原因了。由此，这本书的重大价值就在于他衔接了“民国学术”与“清代学术”的“内在理路”（这里取泛化的意义之意，并不局限于余英时先生所论述的背景那样），揭开了两者的双向“遮蔽”，使得在“缘在的境遇”（Dasein,这里取在张祥龙的“文-化”译文）上事物的本来面貌向我们自身“澄明”，给人一种在“丛林”中看到“一大片林中空地”的明亮之感。其实，换一种角度，从“哲学”的层面来看，“中国本位”的“儒学复兴”的问题已被“新儒家”开启已久，但是吊诡的是，“儒学现代化”的视域在人文学科领域全面开启之际，知名哲人已从“中西之争”的视域转换到“古今之争”的论述视域，而这一境遇不是发生在台湾，抑或也可以说不在大陆内部，而是承载诸多具有“四五”背景的“流亡学人”的香港（人们常有“中国学术在台湾，香港是文化的沙漠”的“偏见”），这一吊诡似乎可以这样理解：这种“地域”的不断转换与偶在性恰恰体现了“学术”的偶在性以及流动性，更加体现了大陆，这一“母体”所散发出的其他地域永不可比拟的“生发性”以及“开创性”。“缘在”的境遇清晰之后，接下来就回到主题上来进一步深发，从“知人论世”的层面看，丘为君先生可谓是历史学研究中的“理论高手”，对西方现代的知识论述都有精深的理解和认识，特别是对诠释学理论更是到了“熟能生巧”的地步，这一方面可以从题名和谋篇布局中发现；另一方面本书浓厚的理论色彩更加体现在文章的肌理里，从引号中那些“别具匠心”的感念引用与转义（Tropology）就可窥知一斑，在此就不一一引述那些在阅读中给人耳目一新的“新工具”了，仅就第一个层面来加以论说，作者论说的原点是清代中期的“戴震”，采取的论证策略则是“戴震”式的方法论（“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以程朱之旨还之程朱，以陆王佛氏之旨还之陆王佛氏”的方法论[见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这一观点被胡适之称为“剥皮主义”，其实梁启超已有这种卓识：“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当取此前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巢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理；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见《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这同时也是我们当前喜欢引用“诠释学”理论），围绕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的“戴震学”研究而建构了“戴震学形成”的谱系。由此，以“戴震”为原点而达到了“读者”与“层累的作者”（戴震、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在“效果历史”层面上的一次“诠释学循环”。但是这种“诠释学”方法不同于戴东原的哲学方法（“新工具”），戴东原的“新工具”更具有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批判”性质，而作者的诠释学方法则更多是一种“了解之同情”[see Martin Jay, "Should Intellectual History Take a Linguistic Turn? Reflections on the Habermas-Gadamer Debate"]。按：本段引文同来自本书的注释。在结束这篇小评论之前，还是略显意犹未尽，这就是本书的附录部分：《清代思想史“研究典范”的形成、特质与义理》（原刊《清华学报》24卷4期，1994年12月），如果本书给人一种三段式的“复调”之感的话，这篇附录可谓是此书最好的“前奏曲”。附录的论述是这样开始的，对清代思想史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三个重要理论：“理学反动说”、“每转益进说”、以及“内在理路说”（theory of inner logic）。这三种学说分别构成了清代思想史研究的三个重要的“研究典范”（Research paradigm）。这里的论说不仅是“三段论”式的，而且“主人翁”也是四个人（梁启超、胡适、钱穆、余英时；论说的原点从“戴震”变成了“清学”，这一细化以及“生命”化尤为值得玩味）。“理学反动说”是梁启超论述清学（近三百年）特质的重要观点，从整体的“思潮”发展脉络来看，清学则以“复古”为手段，而以“解放”为最终目的，也即是“以复古为解放”这一特征上。其表现形式就是反“王学”、反“程朱”、反“许郑”，反“一切专注”四个阶段，对应着“启蒙”、“全盛”、“蜕变”、“衰落”四个时期。这种“以复古为解放”的清学解释策略就为“五四”时代反“孔孟”以复先秦“诸子”之古提供了理论依据，就为“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的西学主题铺平了道路。这种解释策略在钱穆看来却造成了儒学自身的双重危机，一方面无法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而做出积极的反应，另一方面，在激烈的“解放”下，加重了儒学内部的强烈危机。由此钱穆就提

《戴震学的形成》

出“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图穷而必变”的“每转益进说”。在与梁公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自序里道出余英时一再引为圭臬的格言：“不知宋学，则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这也即为“中西古今之争”最为显著的学术“事件”。从“谋篇布局”上来看，作者似乎并没有体会到这一政治哲学的深刻内涵，“三”的论述更多是一种“好事者”的心态，并不能体现“二”的“张力内涵”，在清学的论述上胡适以及余英时的历史身位只是梁启超与钱穆之争的“二重唱”，并没有革命性的“典范”意义。从时间的绵延上来看，梁启超与余英时在处于两端，执其“中”者则为胡适与钱穆；而梁启超、胡适、钱穆则是近代的，余英时则是现代或者说后现代的。这一内涵似乎作者也没有注意到。从意识形态的蕴含上来看，梁启超、胡适显然是“激进主义”的，而钱穆与余英时则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自由主义”……这一点作者虽有注意到，可惜没有深入，只是给出了一个“吊诡”式解读……最后，就“典范”（paradigm）的概念运用上，我想引述一篇旧文新刊作为结束：“一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与建立，必定有开创和守成两途。开创的，对前代的学术思想怀疑了，因而引起一种反动，反动的力量一大，便自己建立一个体系来代替前者。守成的，则承接前代已有的规模，来修正它，扩充它，成为一个新的境界。我们纵论一代学术的大概，必定兼具看此二者，才算看到全体。”（任锡善：《唐学》，载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血气与政治》，经典与解释丛书18，华夏，2007，pp304）。按：郑吉雄有一篇哈贝马斯式的“批判”诠释性质的书评，集中在“以考据学知识论述的复杂性、刘申叔论戴东原、日本学界关于戴东原以及乾嘉学术的论说”这“三段”上加以质疑（《评丘为君<戴震学的形成>》，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2卷第1期，2005年6月）。

《戴震学的形成》

章节试读

1、《戴震学的形成》的笔记-第175页

丘为君讲戴震，也拉着讲了点西方自然法的比较。下面这一段讲霍布斯讲得不错：

两位英国思想家霍布斯与洛克便转往讨论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下的人权问题——自然权利。前者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私自利的，以保存自我的生存为优先考虑。而为了保存自我的性命与利益，人可以在“自然权利”的意义下，进行有益于自我但可能不利于别人的活动。换句话说，自然状态其实是一种“战争状态”。为了不使人类这种自私的天性造成群体的在生存与活动上的障碍，因而必须有“社会契约”的设计，即个人放弃某些权利以拥戴一个共同的、绝对的权威——主权的权威。

和霍布斯的立场稍有不同，洛克认为自然状态并非战争状态，而是一种快乐与平和的状态。不过他接受霍布斯的“社会契约”概念，相信建立在这种作为道德与法律之源泉的主权权威设计下，人类在生命、自由、财产等方面，便都可以获得保障。

下面是我自己写的：你看仅仅一个自然状态的差异，霍布斯和洛克的理论就差了十万八千里。霍布斯就推出了一个暴力机器——利维坦，这就跟当下的天朝很相似。而洛克就得出了民主自由的社会契约论，也就是当下英美所接受的政府。

2、《戴震学的形成》的笔记-第150页

以引进美国哲学家杜威实用主义（pragmatism）在20世纪初叶中国推动思想革命的胡适认为，这里主要有两层原因：第一，不讲究实用；第二，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所谓“不讲究实用”，这是指程朱“格物”观所欲探求的对象，并不是自然世界诸事物的各种理则，而是一种关于宇宙之最后的绝对真理。这种立场使他们发展出一套反对实用性的“非用说”。程颐过世前所说的“道着用，便不是”，便是此一“非用说”的最佳批注。在这种轻视实用性的心态下，加上缺乏科学的工具器械，科学自然没有可以开花结果的园地。至于“缺乏科学方法论”的第二层原因，这就是西方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假设与实验——而言。即这两个西方科学思想里的必要成分，在强调“理”之概念的理学传统里，找不到被重视的痕迹。根据胡适，宋儒的“格物”理论是完全不重视假设的；而没有假设，自然也就谈不上实验的概念。上面是丘君的话，下面是我的：从当时的水平看来，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看得还是很深刻的，他提出的观点也是有相当意义的，他企图从哲学深层次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可以说是当时的学术界、思想界最厉害的一人。从现在的观念来看，胡适对中国儒家思想看得还是不够深刻，他所提出的实用主义也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

《戴震学的形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